

董娜 著

Jiyu Yuliaoku De “Yizhe Henji” Yanjiu
——Linyutang Fanyi Wenben Jiedu

基于语料库的“译者痕迹”研究

——林语堂翻译文本解读

社会科学出版社

ISBN 978-7-5004-8630-5



9 787500 486305 >

定价：28.00元

董娜 著

Jiyu Yuliaoku De "Yizhe Henji" Yanjiu
——Linyutang Fanyi Wenben Jiedu

基于语料库的“译者痕迹”研究
——林语堂翻译文本解读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数据加载失败，请稍后重试！

目 录

导 论	(1)
第一节 翻译研究发展趋势	(1)
第二节 语料库翻译研究	(9)
第三节 翻译研究中的译者问题	(19)
第四节 研究目的、意义及研究框架	(24)

第一部分 “译者痕迹”及其历史起点

第一章 “译者”与“译者痕迹”	(37)
第一节 “译者痕迹”概念界定	(37)
第二节 “译者痕迹”与“译者身份”演变	(41)
第二章 “译者痕迹”存在的理论基础及研究综述	(48)
第一节 多元系统理论下的“译者痕迹”	(48)
第二节 解构主义翻译论下的“译者痕迹”	(50)
第三节 女性主义翻译论下的“译者痕迹”	(52)
第四节 后殖民主义翻译论下的“译者痕迹”	(53)
第五节 “译者痕迹”研究综述	(57)

第二部分 “译者痕迹”理论、分析框架 及解释机制

第三章 “译者痕迹”理论及分析框架	(69)
第一节 “译者痕迹”相关概念	(69)
第二节 “译者痕迹”研究方法	(71)
第三节 “译者痕迹”分析框架	(73)
第四节 语言性“译者痕迹”分析	(73)
第五节 非语言性“译者痕迹”分析	(82)
第四章 “译者痕迹”解释机制及应用前景	(87)
第一节 译者外部制约因素	(87)
第二节 译者个人因素	(95)
第三节 “译者痕迹”研究成果的应用前景	(99)

第三部分 基于林语堂翻译语料库的 “译者痕迹”分析

第五章 林语堂及林语堂翻译语料库	(103)
第一节 翻译家林语堂	(103)
第二节 林语堂“译者痕迹”假设——糅杂性	(108)
第三节 林语堂翻译语料库的建立	(112)
第四节 林语堂翻译文本概述	(114)
第五节 林语堂翻译语料库的基本数据统计	(119)
第六章 林语堂翻译文本的语言性“译者痕迹”分析	(133)

第一节	翻译文本的糅杂性	(134)
第二节	林语堂翻译文本的糅杂性	(136)
第三节	林语堂翻译文本的语言糅杂	(138)
第四节	林语堂翻译文本的文化糅杂	(158)
第五节	翻译文本的文化糅杂与译者人生经历	(182)
 第七章 林语堂附加文本的语言性		
	“译者痕迹”分析	(186)
第一节	翻译文本中的译者姓名	(186)
第二节	翻译文本中的序言跋语	(187)
第三节	翻译文本中的注释	(199)
第四节	其他附加文本的使用	(208)
 第八章 林语堂源语文本的非语言性		
	“译者痕迹”分析	(210)
第一节	林语堂翻译语料库的关键词表	(211)
第二节	林语堂翻译文本的两个主题	(220)
第三节	林语堂翻译文本与东方学	(227)
第四节	林语堂翻译文本与赞助人	(232)
 结 论		
第一节	研究总结	(235)
第二节	研究创新及意义	(240)
 参考文献		
 附 录		
		(266)

4 基于语料库的“译者痕迹”研究

附录 A	林语堂翻译语料库数据统计	(266)
附录 B	林语堂翻译文本的数据统计	(268)
附录 C	林语堂译作《归去来辞》的译文及原文	(272)
附录 D	林语堂译作《孔子的智慧》的序言	(276)
附录 E	林语堂翻译语料库中古体/诗体的 词汇检索	(281)
附录 F	主要图表一览表	(292)
附录 G	中外译名对照表	(294)
后 记		(299)

导 论

第一节 翻译研究发展趋势

翻译之事，由来已久。关于翻译的由来，金圣华（1997：3）在《桥畔译谈——翻译散论八十篇》中有过非常生动的描述：

翻译就像一座桥，桥两端，气候悬殊，风光迥异。两端之间，原隔着险峻的山谷、湍急的溪流。两旁的人，各忙各的，世代相传，分别发展出一套不同的习俗风尚以及语言文化来。

有一天，这不同文化习俗的人，忽然想起要跟对岸打个招呼。怎么办？要渡过峡谷，不得不起一座桥……

从本质上说，作为一项重要的文化交流活动，翻译恰如一座桥梁，把两个相异的文化连接起来，在跨文化交流过程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与之相应，频繁的翻译活动又引发了人们对翻译问题的思考。人类对于翻译的思考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而且从来也没有停止过。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之后，翻译

2 基于语料库的“译者痕迹”研究

研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相关学科的参与,一方面拓宽了翻译研究的领域,另一方面也加深了人们对于翻译活动本质、规律的认识,同时翻译理论界鲜明的学科意识也逐渐表现出来。^①

本书的选题与当代翻译学的发展趋势密切相关。当代翻译学分支众多,虽然一些研究者认为翻译研究或翻译学^②已经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如 Bassnett, 1991; Snell-Hornby, 1988/1995/2001; Gentzler, 2006),但也有学者(如 Steiner, 1992; 劳陇, 1996; 张经浩, 1999)心存疑虑,因为翻译学就整体而言还不能说已经形成完整的理论框架,各学派之间的分歧和矛盾广泛存在。詹姆斯·赫尔姆斯(James Holmes)所提出的翻译学理论框架虽然为多数学者所接受并被翻译研究学派付诸实践,但自1972年该框架提出以来,无论是语言学派翻译理论

① 国际翻译理论界表现出鲜明的学科意识始于詹姆斯·赫尔姆斯(James Holmes),他在1972年发表的《翻译研究的名称与性质》(*The Name and Nature of Translation Studies*)一文探讨了翻译作为一个学科的名称、性质和范围等问题。国际翻译理论界公认,翻译研究作为一门学科领域的崛起,标志是1976年在比利时鲁汶举行的一次研讨会。1978年,勒菲弗尔(André Lefevere)建议将 Translation Studies 作为翻译学科的正式名称,为后来翻译理论研究的发展准备了条件。进入80年代之后,翻译理论研究的繁荣表现在设立独立的翻译系和翻译专业的大学;另外,巴斯内特(Susan Bassnett)出版了第一本以“翻译学”为书名的学术专著;1981年创办了翻译研究的国际性学术杂志 *Target*,这本杂志在1989年又增加了一个副标题: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ranslation Studies*。

② 关于翻译学科的名称,有许多不同的称呼,如翻译学(translatology),翻译研究(translation studies),翻译科学(science of translating 或 science of translation)。赫尔姆斯于1972年提出的“翻译研究”(Translation Studies),后经勒菲弗尔、巴斯内特和图里等人的倡导被国际上广泛接受作为这个学科的名称,但翻译研究又可以用于指赫尔姆斯、巴斯内特和勒菲弗尔所开创的“翻译研究”学派,因此,在术语上容易导致混淆。潘文国(2002a)建议在作为学科名称时译为“翻译学”,而作为学派名时不妨译为“翻译研究学派”。笔者认为学科名称应当准确,故采用潘文国的建议,统一使用“翻译学”作为“Translation Studies”的译名。

还是翻译研究学派本身的发展，以及后来的后殖民理论和解构主义翻译理论，都并不能完全容纳在这个框架中（胡显耀，2005：3）。翻译学缺乏相对统一的术语体系，缺乏严密而系统的方法论，学派之间的分歧和排斥多于借鉴和融合，后提出的理论学派对先前的一切流派往往都具有颠覆性的作用甚至连学科名称都因此而存在争议（Gentzler, 2006：2）。

尽管如此，当代翻译学所取得的成就，毋庸置疑。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翻译理论在语言学理论、比较文学、文化研究和哲学等各个学科的促进下逐渐从萌芽状态发展成为比较发达的理论流派。从 50 年代到 70 年代，语言学翻译理论得到了更充分的发展并成为这一时期的主流。70 年代是翻译研究的转型阶段，1972 年赫尔姆斯发表的论文《翻译研究的名称与性质》（*The Name and Nature of Translation Studies*）成为翻译研究从语言学占统治地位转向其他学派的标志。在此之后，语言学派的缺陷开始受到各方的批判，从而走向衰落并开始反思和发展自己的理论。70 年代至今的当代翻译学发展应该说是得益于语言学理论的修正和补充，与此同时，文化学派翻译理论则由崛起到强盛并占据主导地位。

“文化学派”指的是苏珊·巴斯内特（Susan Bassnett）和安德烈·勒菲弗尔（André Lefevere）所开创的理论流派，因为两人多次提出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cultural turn）（潘文国，2002a, 2002b, 2002c）。“文化学派”也是对这些非语言学流派的统称，主要包括：埃文-佐哈（Even-Zohar）的多元系统论和吉迪恩·图里（Gideon Toury）在其基础上提出的描写翻译学；以勒菲弗尔和巴斯内特为代表的“重写”学派（也称“翻译研究”学派）；及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兴起的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和解构主义翻译理论，等等。

巴斯内特和勒菲弗尔的主要贡献在于,把翻译置于一个广阔的文化背景中去研究,强调历史意识和文化观点,提出了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问题。“文化转向”极大地扩展了翻译学的研究领域,但是他们对意识形态(ideology)、诗学(poetics)、赞助人(patronage)等因素的区分似乎将文化体系视为一个静态的、既定的并可以明确划分的系统,无视文化内部的不均衡性和文化之间的不平衡性,将翻译及其发生的文化环境理想化,翻译中所存在的性别歧视、权力关系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在研究方法上,“翻译研究”学派主要关注的仍然是文学文本的翻译和文学文本所处的社会文化背景的研究,其理论更多的是对与翻译有关的文化现象的研究,而不是对翻译机制本身的研究,基本上不涉及翻译的语言层面和应用层面。

女性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在90年代中期以后实际上不约而同地走了解构主义的道路。这些流派的侧重点虽然各不相同,但最终目标无不指向对旧的理论权威的批判。解构主义对翻译学最大的贡献在于打破了原有的结构主义秩序,让人们看到这些秩序的不合理性,将“主体因素”、“时间性”和“权力与话语”三个重要的概念引入了翻译研究(吕俊,2002:63—66)。然而,解构主义正如其名,它是一种怀疑的理论,一种反思的理论,甚至对于旧有理论而言是一种破坏性的理论,而非建构性的理论,在瓦解和颠覆的同时,不能为人们提供新的秩序和理性。

由此可见,尽管文化学派为当代翻译学开辟了广阔的领域,建立了基本的理论框架,指出了基本的研究途经,但其内部流派之间存在的分歧和矛盾远远多于借鉴和融合。“文学译者会排斥语言学方法的‘行话’;解构主义者颠覆了符号学家所召唤的‘科学’术语;而解构主义者富于攻击性的言辞将诸

多领域的学者排斥在外。”(Gentzler, 2006: 2) 从 20 世纪 60 年代到 80 年代“不同理论阵营的代表们很少进行对话。学者们各自为政, 各种理论的‘新意’威胁着既往的理论模式”(Gentzler, 2006: 187)。新的理论往往是对旧的理论的颠覆, 这样的局面造成了翻译学难以形成一种凝聚力, 难以发展成为一门既有理论又有实证的学科, 形成完整的术语体系, 缺乏真正行之有效并可以重复的研究方法。文化学派在进入解构主义阶段后, 这种体系上的散乱和方法上的困境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来。而与此同时, 时间上早于文化学派的另一大流派——语言学派却在不断进行着反思和发展。

20 世纪 50 年代至 70 年代末, 语言学派的翻译理论曾经占据翻译学的绝对统治地位。语言学翻译理论流派(或翻译“科学”流派)为推进翻译研究的系统化进程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它为翻译研究提供相对统一的术语体系和比较严谨的理论框架。80 年代以来, 语言学翻译理论受到了来自勒菲弗尔、巴斯内特、西奥·赫曼斯(Theo Hermans)、玛丽·斯内尔-霍恩比(Mary Snell-Hornby)等人的激烈挑战。传统语言学翻译理论的科学主义姿态、翻译对等的幻想、对译者的忽视、局限于语言分析和忽略翻译的文化输入等受到许多批评。90 年代, 文化学派和后现代思潮的蓬勃发展进一步动摇了语言学翻译理论的地位。罗斯玛丽·阿洛尤(Rosemary Arrojo)、艾德温·根茨勒(Edwin Gentzler)和劳伦斯·韦努蒂(Lawrence Venuti)等人从后现代哲学的角度批判了语言学翻译理论, 语言学家所谓的客观中立性、科学主义及其对语言本质的认识都受到了质疑, 语言学一统天下的局面从此不复存在。但是人们在批判语言学派时往往将费迪南·德·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开创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和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的

“转换生成语法”与所有语言学翻译理论等同起来。肯尼·多萝西 (Kenny Dorothy) (2001: 18) 曾尖锐地指出韦努蒂和根茨勒在批判语言学派时将语言学统统视为精神主义和形式主义的“毫无差别的巨石”。“习惯于将非本质主义的, 非普遍化的研究方法视为语言学派的例外而不是规则。” (Dorothy, 2001: 20) 后现代思潮在批评语言学理论时往往把结构主义语言学视为语言学的全部, 从而否定所有语言学翻译理论的价值。

但事实上语言学派中虽然有 50、60 年代以罗曼·雅克布逊 (Roman Jakobson), 尤金·奈达 (Eugene Nida) 等人为代表的传统语言学翻译对等论者, 也有以维纳 (Jean-Paul Vinay)、达尔贝勒内 (J. Darbelnet)、约翰·卡特福德 (John Catford) 等人为代表的翻译变异论者; 同时也有 70、80 年代兴起, 由凯瑟林娜·赖斯 (Katharina Reiss)、贾斯塔·赫兹·曼塔利 (Justa Holz-Manttari)、汉斯·弗美尔 (Hans J. Vermeer) 等人所开创的功能主义 (目的论); 韩礼德 (M. A. K. Halliday)、巴兹尔·哈蒂姆 (Basil Hatim)、伊恩·梅森 (Ian Mason) 及莫纳·贝克 (Mona Baker) 等人在话语分析和语域分析等领域进行的翻译研究; 还有一直与乔姆斯基语言学共存发展的弗思 (J. R. Firth) 的社会语言学翻译研究, 当然更有 90 年代末兴起的语料库翻译研究。因此, 在批评语言学派翻译理论时, 我们不能不注意到: 即使在语言学理论内部也并非所有语言学家都主张语言与言语, 能指与所指、意义与形式的可分离性; 并非所有语言学翻译理论都忽视翻译与社会文化语境和译者主体性之间的关系: “内省式”或精神主义的方法也并非语言学翻译理论的唯一的研究方法。

人们对翻译现象探索角度的多元化和由此形成的各种翻译

研究模式 (research model): 从专注于原文的实践模式 (practical model), 到聚焦于译文的批评模式 (critical model); 从针对翻译所涉及两种语言系统的描写与比较的语言学模式 (linguistic model) 到研究翻译过程的心理语言模式 (psycholinguistic model), 描写译文语篇各种环境因素的文化模式 (cultural model) 以及专论机器翻译 (包括机器辅助翻译) 的计算模式 (computational model) 等。另一方面, 伴随着研究视野的扩大和对翻译本质认识的深化, 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已不再持翻译只不过是两种语言间的符号转换的狭隘见解, 而把翻译看做一种社会文化情境中的交际行为, 对翻译的研究领域已经扩展到这一行为过程中所涉及的多种语言、社会、文化等因素的观察, 如研究作者、译者和译文读者, 研究作者的写作目标和创作意图、译文读者对译作的需要和期待, 研究这些因素对译者翻译策略的影响并据此予以描写和阐释等。显而易见, 这种视野的翻译研究早已不是传统的、结构主义语言学所立足于源语与目标语两种语言系统静态描写的研究模式所包容得了, 而是更多的转向对语言外 (extra-linguistic) 社会、文化因素的探索。这不仅使翻译研究跳出早先那些依附于语言学的附庸地位而开始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而且进而形成了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 走向了斯内尔-霍恩比提倡语言学与文化分析相结合的综合途径 (integrated approach)。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 翻译学的两大主要流派之间出现了一些新的趋势。不同学派的翻译理论家正努力缩小彼此的分歧。这些趋势包括:

(1) 研究对象从单一化与凝固化转向多元化与交叉化。当代翻译学早已不再局限于字词层面的语言对比, 各个流派关注的话题既有共同之处又各有侧重。翻译的各个层面在翻译理论

中都得到了体现：原文、译文、译者、作者、读者、翻译过程、翻译规范、文化因素、意识形态、权力关系……语言学派和文化学派研究的领域出现了许多交叉地带。

(2) 研究方向从静态转向动态。语言学派对结构主义语言观的扬弃，社会语言学的发展，多元系统论的动态结构主义等等都表现出这一趋势。

(3) 研究重心从源语和源语文化转向目标语和目标语文化，从翻译产品转向翻译过程，从翻译制约转向译者本身，从客观性转向主观性。

(4) 研究方法从规约转向描述。这个趋势最突出表现是90年代末从语言学派中脱颖而出的语料库翻译研究方法和几乎同时产生的描写翻译学。二者在描写性的、自下而上的(bottom-up)研究方法上的殊途同归使得语言学派与文化学派的融合成为可能。

本书采用语料库语言学方法来研究“译者痕迹”的基本思想也正是来源于这种结合。正如斯内尔-霍恩比(1998年)曾总结过，翻译研究早已超越了一门学科的限制，成为了一门交叉学科。语言学和文化研究学派的逐渐融合也许正是翻译研究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前奏和必经之路。

任何一门成熟的学科都必须与其发展的理论相一致，同时必须经得起实践的检验，并具有科学的数据和方法。翻译研究也不例外。近年来，国内外的翻译研究的学者理论联系实际，积极探索翻译学的方法论，其中建立翻译语料库便是这一研究的具体体现。而且语言研究离不开对语言材料的充分收集、整理和分析，而翻译则涉及至少两种语言的转换，正是出于这样的原因，建立在现代计算机技术基础上的语料库得以产生。

第二节 语料库翻译研究

一 语料库翻译研究概述

20 世纪下半叶以来, 翻译研究处于一个多元化的时期, 翻译研究兼收并蓄, 超越了单一学科的界限, 成为具有跨学科特色的综合研究学科。翻译学要正确描述和解释翻译活动, 必须要依靠科学的认识论和先进的技术方法。20 世纪 90 年代以前的翻译研究多以定性为主, 理论阐释居多, 而缺乏数据和量化的支持。翻译研究要想向前迈出一大步, 从直觉到科学, 从感性到理性, 从个性到共性, 从局部到整体, 就必须把译者在实践基础上总结的个人经验归结到系统的科学上来, 用科学的方法进行验证和说明 (罗选民等, 2005: 52)。这也正如安德鲁·切斯特曼 (Andrew Chesterman) (1998: 201) 所指出的, 20 世纪 90 年代翻译研究大致有三个趋势: “一是从关注翻译本身的研究兴趣扩展到关注译者和翻译策略的研究。二是从规定性的方法转向描述性的方法。三是从哲学概念的分析转向验证式的研究。”王宁 (2006a: 9) 指出, 定量分析主要是致力于语言学层面对翻译文本的对比和分析, 在这一层次上, 强调科学性, 并以语料分析的缜密性为其特色。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推动了语言和翻译研究, 而翻译的语料库研究则结合了翻译研究的相关理论, 在语料库语言学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

西方现代翻译研究在方法论上的变迁——从经验式研究到语言学取向, 从文化转向到语言学回归——为我们对翻译研究的认识提供了有益的启示。玛丽亚·蒂莫兹科 (Maria Tymocz-